

日本研究论集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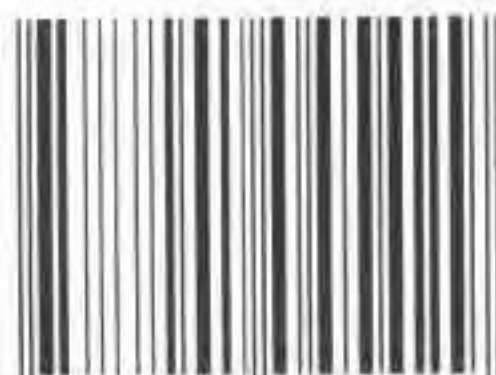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 艺

封面设计/杨 炆

ISBN 7-201-04542-3



9 787201 045429 >

ISBN 7-201-04542-3 定价:30.00元

日本研究论集

2004

(总第9集)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研究论集. 2004/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8

ISBN 7-201-04542-3

I. 日… II. 南… III. 日本—研究—文集
IV. 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64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6.1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370 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30.00 元

目 录

- 缅怀恩师吴廷璆先生 杨栋梁(1)
- 关注现实热点,探索发展途径
-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 王美平(10)
- 关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探讨 米庆余(16)
- 对当前中日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张 健(36)
- 艰难的改革,迷茫的前途
- 小泉内阁政策分析 王 湧(52)
- 日本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政策(1957—1971)
..... 连会新(69)
- 美国政府的对日媾和主张与台湾问题 张耀武(86)
- 日本强占钓鱼列岛始末 臧佩红(106)
- 近代日本侵华军事地图的测绘 曹大臣(117)
- 日、美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其比较 刘 毅(133)
- 日本汽车产业在东盟的动态发展及其对我国新型工业化
道路的启示 白雪洁(152)
- 当前日本投资与贸易法规浅析 石其宝(169)
- 在华日本中小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分析

- 以对十一家企业的调查为中心
- 驹形哲哉(182)
- 日本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力资源困境
- 史丽华(203)
- 日本国际旅游波动原因与政府对策分析
- 陈友华(215)
- 日本来华旅游市场浅析
- 李文明(227)
- 从往来物看日本前近代教育的嬗变
- 谭建川(239)
- 略论德川时代的商人教育
- 程永明(253)
- 试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平民化
- 向 卿(269)
- 日中两国牛痘接种法普及之差异与江户时代的人口统计
- 田崎哲郎(284)
- 培理来航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
- 从国际关系解释的多义性到单一性
- 三谷博(294)
- 明治维新再探讨:变革与权力互动关系的分析.....
- 李海英(306)
- 福泽谕吉的西洋文明观
- 郭 丽(323)
- 涩泽荣一经济思想述评
- 张建立(340)
- 近代日本的技术移植——以石油产业为例
- 石田文彦(356)
- 明治初年的《学制》
- 石艳春(374)
- 关于家族制度与中日经济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思考
- 李 卓(385)
- 浅谈日本摄取外来文化的特性
- 赵德宇(402)
- 民国时期留日学生与译书活动
- 李翠莲(409)

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考

- 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笔谈资料为中心 ……………
 …………… 刘雨珍(422)
- 浅论日本的教育行政改革 …………… 张玉姣(440)
- 《蛇性之淫》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异同之比较 ……………
 …………… 王慧荣(455)
- 《我是猫》的幽默与讽刺手法 …………… 钟 放(472)
- 莫把弘文“时间割”误作“一小”课程表 …………… 武安隆(481)
- 福泽谕吉研究的新挑战
- 安川寿之辅及其新著《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 ……………
 …………… 许 岩(488)
-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日本股份公司制研究
- 评刘毅《日本股份制变革研究》 ……………
 …………… 杨栋梁 张杰军(502)

一中任教，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返北平后因政治形势险恶流亡日本，发奋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史学科，专攻亚洲史和东西交通史。1936年毕业归国，任青岛山东大学讲师。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生弃笔从戎，满怀激情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事业，在南京经叶剑英介绍，赴山西参加八路军，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干事。1939年末，先生曾参加营救范文澜先生出狱的活动，后在西北及西南从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民主同盟）地下工作。1942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燕京大学（内迁成都）历史系教授，期间与李相行、马哲民组织“唯民社”。1944年与许德珩、刘及辰等组织“民主科学社”（1946年改称“九三学社”），同年起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任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支部委员。

1949年，因范文澜先生力荐，吴廷璆先生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校总务长、历史系主任。同时与孟秋江、刘清扬等筹组民盟天津市委和民盟河北省委。1951年当选为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长，历任天津市文教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文革”期间，先生亦受到冲击，但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以后，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积极投入到科学研究、教书育人和社会活动中去。在南开大学，吴先生历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1977年，先生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副主席。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编委兼亚洲史组主任。1981年

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79年以来，历访朝鲜、日本、苏联、波兰及原民主德国等国，三次应邀赴日出席学术会议并讲学。在此期间，吴先生先后担任中国亚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顾问，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和名誉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此外，解放后他一直担任核心学术期刊《历史教学》总编，时间长达40年之久。

二、新史学与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

吴廷璆教授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六十余载，学兼中外，史论并重，擅长亚洲史和东西交通史，更是学术界公认的新中国日本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亚洲史部分于1990年出版；《日本史》于199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近代化研究》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日本史》洋洋百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日本通史专著。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则收入《吴廷璆史学论集》，并于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建立后，亟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清除旧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以构建新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吴先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初期，先生便主张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并据此进行历史时期的划分，同时强调要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从整体上把握亚洲史和日本史。先生主张“社会科学要为社会服务”。认为史学的价值不仅能“鉴

古知今”，而且能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保有源头活水，避免“人生或社会”的“枯燥和衰落”。1961年4月9日和10日，《光明日报》连载了先生撰写的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文中尖锐批评西方史学家的“欧洲中心论”，指出“人类世界是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历史自然应该是全面的”，把东方排斥在“文明世界”圈外不仅反科学，也是反动的。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世界史新体系的方案，即“将世界史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分为五个时代，采用综合年代法叙述每个时代总的特征和各国人民的具体历史。分期的基本原则是将最先进的国家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时期作为这一时代的起点，同时照顾到各国历史发展的个别性”。先生指出：“这样的体系，既阐明了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也指出了历史上新的、先进的东西和旧的、没落的东西，鲜明地揭露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和各国人民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从根本上打破了欧洲中心说的世界史体系，保证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学性。”该文发表后，在中苏世界史学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先生的这些学术思想，对建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新体系起了铺路奠基作用，并早已为国内史学界所肯定。

早在建国前，吴先生就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讲授日本史、亚洲史课程，1956年为教育部编订全国高校亚洲史教学大纲，1960年参加《世界通史》的编撰，负责中古史中的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部分，由于这部通史首次将亚洲的内容纳入到世界史中，其开拓之功不可没。

先生对日本史学研究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对日本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性质的评价上，这涉及到日本历史分期和对日本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1955年，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创刊号上发表《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他认为,“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崩溃了,部曲民(奴隶)脱离了豪族的统治。从农村公社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变成了班田农民……另一方面,由于“班田法”的实施,天皇成为最高的封建主,官僚贵族们又用各种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奴隶。这说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已从父家长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了”。这些论断,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使大化改新和日本历史分期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得到中日两国日本史学家的普遍认可。

1964年7月,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革命与改革“两点论”澄清了日本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模糊认识,指出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1982年又与武安隆教授合作发表《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收入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进一步论证了后进国家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是成立的。这就是被中日史学界广泛重视、对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说”。先生认为,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其第一阶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德川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因倒幕派的背弃革命而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明治维新通过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废除了

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和资本家一起推行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完成的。

三、治学与育人

吴先生治史，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十分重视生产关系的作用。先生认为：在日本早期国家邪马台国的形成及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过程中，生产关系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单从生产力的水平上解释不了这些事实。“我们肯定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否认社会变革中生产力是基础的看法，但生产力是受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制约，它促进或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起着积极或消极作用。”先生进而以明治维新为例指出：“单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点不能说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很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19世纪后半叶，东方封建国家日本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若不反帝、反封建，不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只有灭亡。因此，尽管当时日本生产力还较低，但在内忧外患的紧急关头，特别在开港后，阶级斗争空前高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终于被迫实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直接决定日本国家民族的命运。”

实证研究是吴先生治学的又一特色，如对汉代商业的认识，就是以缜密的实证考察为基础进行的。“随着商路的开通，内地的商业也显著发达起来……汉朝终于放弃了过去狭隘的闭关政策。为此，汉武帝一边招徕外国客人，一边开始经略西域”。这一研究不仅对汉代商业进行了分析，而且能站在新的高度上，把汉代的商业发展与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国际经济贸易结合起来，进而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先生育人有两个特点：一为“授人以渔”；二为教人以德。从1936年执掌教鞭起，先生在大学从教六十余年，聆听先生授课的学生难以计数，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有志于日本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投身于先生门下。先生授业尽展大家风范，学习上从不对学生做硬性要求，而是强调治学的自主能动性，尽可能让学生自己找问题、想问题、出思路、出观点，循序善诱，因势利导。对于学生的学习汇报，总是耐心听取，即使汇报内容浅陋，亦从不见责。至审改毕业论文阶段，先生尤其看重论文的大局观和文字修养，审改时亦可谓字斟句酌，严谨之至。先生德艺双馨，心胸豁达，待人和蔼而宽厚，绝无凌人盛气。这种为人师表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他的学生和后辈。如今，在先生培养的数十名硕、博士中，硕果累累，不少人已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挑起大梁。

先生虽已乘鹤西去，但先生的思想财富永存；先生撒播的日本研究的种子，也正在以物的形态在祖国各地生长、开花、结果并继续繁衍。先生可以安息了！

实证研究是吴先生治学的又一特色，如对汉代商业的认识，就是以缜密的实证考察为基础进行的。“随着商路的开通，内地的商业也显著发达起来……汉朝终于放弃了过去狭隘的闭关政策。为此，汉武帝一边招徕外国客人，一边开始经略西域”。这一研究不仅对汉代商业进行了分析，而且能站在新的高度上，把汉代的商业发展与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国际经济贸易结合起来，进而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先生育人有两个特点：一为“授人以渔”；二为教人以德。从1936年执掌教鞭起，先生在大学从教六十余年，聆听先生授课的学生难以计数，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有志于日本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投身于先生门下。先生授业尽展大家风范，学习上从不对学生做硬性要求，而是强调治学的自主能动性，尽可能让学生自己找问题、想问题、出思路、出观点，循序善诱，因势利导。对于学生的学习汇报，总是耐心听取，即使汇报内容浅陋，亦从不见责。至审改毕业论文阶段，先生尤其看重论文的大局观和文字修养，审改时亦可谓字斟句酌，严谨之至。先生德艺双馨，心胸豁达，待人和蔼而宽厚，绝无凌人盛气。这种为人师表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他的学生和后辈。如今，在先生培养的数十名硕、博士中，硕果累累，不少人已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挑起大梁。

先生虽已乘鹤西去，但先生的思想财富永存；先生撒播的日本研究的种子，也正在以物的形态在祖国各地生长、开花、结果并继续繁衍。先生可以安息了！

会、中华日本学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顾问，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和名誉会长。

1949年以来，吴廷璆先生还与孟秋江、刘清扬等筹组了民盟天津市委及民盟河北省委，曾任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民盟天津市委名誉主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常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关注现实热点，探索发展途径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美平

2003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上，学界也出现了争论，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2004年4月25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从学术研究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讨论。会议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连大学、辽宁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以及东道主南开大学等17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37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东亚国际政治格局、东亚民族主义、外交新思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一、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

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会议的焦点之一。代表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好，二是不好，三是不好不坏很正常。有学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期，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到1982年的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为

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期；从1982年到1992年的天皇访华，为摩擦与合作并存的时期；从1992年到今天，为对立与合作时期。

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提出，中日历史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在日本，不在中国。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搁置不了的。中日两国首脑不能实现互相访问，关键就在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有学者指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当中已有结论。中日间现存的问题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中国在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也应了解靖国神社的背景，两国都应主动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虽然自1996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恶化的倾向，但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现在的中日关系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因而也不必过分悲观。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中日关系的现状不仅仅是“政冷经热”，在经济“热”中也出现了“官冷民热”的状况。对于当前中日两国民众间的对立情绪，会议代表们表示忧虑。大家普遍认为舆论导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双方的新闻界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着眼于发展中日关系大局。有的学者认为，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东亚区域共同体已不是口号，而已经进入实际探讨阶段。日本民间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双方贸易额不断上升，2003年已经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加深，许多日本人也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日政治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但由于中日